



大公報 110 周年

▶胡政之

作為記者，他是唯一採訪巴黎和會的中國記者。作為老闆，他讓大公報總發行量由初辦時的幾千份一度增長到20萬份並成為全國性大報，不遺餘力延攬、提攜、培養了范長江、徐鑄成、蕭乾、朱啓平、金庸等一批人才，後來都名滿天下。在60年人生歲月中，在大公報服務長達27年。新聞史家評價他與大公報「淵源最深、貢獻最大」。他就是一代報業宗師胡政之。

本報記者 馬浩亮 步瀟瀟

胡政之名言

- 新聞事業之天職有二：一在報道真確公正之新聞，一在鑄造穩健均實之輿論。而二者相較，前者尤重，蓋新聞不真確，不公正，則穩健均實之輿論無所根據也。
- 養成一個好新聞記者，真比養成學者還難。一須本人有天才，感興趣；二須國文好，常識足；三須體質強，能忍耐。至於評論記者，需要豐富的知識，熱烈的情感，公正的觀察，周到的判斷，和一個良好的史官一樣，更難培植。
- 報紙因為是直接反映社會的，所以成功的報紙必須是領導社會前進。求其次，亦必須隨同社會前進。否則這張報紙必遭淘汰。辦報與開舖子不同，不能靠着老招牌的原因即在於此。

胡政之：一顆公心鑄就大報風範



▲胡政之（前排右一）與報館同仁合照

鞠躬盡瘁復刊港版大公報

自110年前在天津創刊，大公報幾經播遷，一度曾經出過天津、上海、漢口、重慶、桂林、香港等六個版。1949年後還曾有北京大公報出版至1966年。時至今日，唯有香港大公報仍然歷久彌新，使得這份百年老報繼續得以傳承。

組建隊伍 網羅人才

胡政之說：「大公報之所以能夠在香港持續出版，成為今日中國的百年老報，追根溯源，也得益於胡政之的辛勤工作。」而著名新聞史學家吳廷俊教授更曾直言：「香港大公報是胡政之拿命換來的。」

抗戰期間，隨着戰事進展，大公報也不斷轉移。1937年，大公報部分骨幹奉胡政之、張季鸞之命到重慶籌備建館。胡政之本人則在1938年3月率人馬趕赴香港，親自領導建館。香港環境生疏，開創基業可說是舉步維艱。胡政之千方百計網羅人才，組建隊伍，終於在8月13日上海抗戰一周年紀念日出版了《大公報》香港版。

胡政之在親自撰寫的《本報發行香港版的聲明》中說道：「在這一年的民族聖聖自衛戰之中，我們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國。只餘一漢口版……現實依然奮鬥着……中國民族解放的艱難大業，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。所以我們更參加到港粵同業的隊伍裡來……雖然備歷艱危，而一支筆，始終在手不放。」抗戰到底的堅定信念，滲透在字裡行間。不到兩個月，銷路激增到五萬份。不但國內發行範圍廣，「世界各地，凡有中國使領館、中華會館和中華學校的地方，幾乎沒有一處不是本報港館的直接訂戶。這種情形，為國內任何報館所未有。」（陳紀澄《胡政之與大公報》）。

港版復刊 五次試版

1941年底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《大公報》港館宣告停刊。胡政之滯留香港，後又率同仁冒險乘船渡海，輾轉跋涉回到桂林。

1948年1月，胡政之率上海部分骨幹赴香港作自己的「最後開創」：籌辦香港版的復刊。經過兩個月的連續苦戰，五次試版，終於在3月15日正式復刊。吳廷俊教授曾評價，港版「簡直就成了他身後的一座豐碑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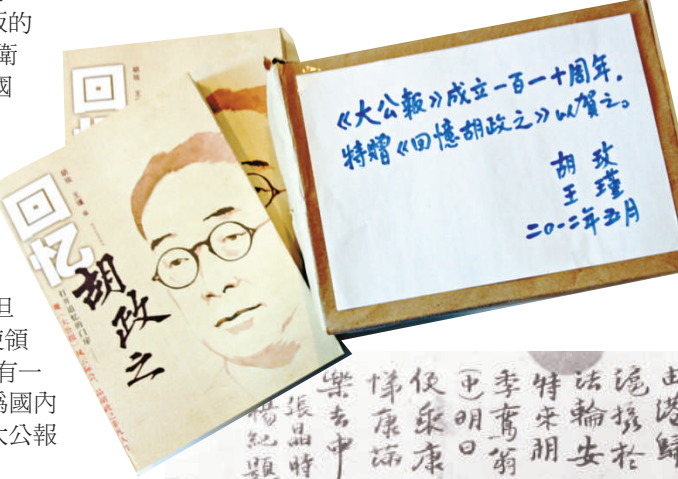
而香港復刊時期過度的疲勞成了導火索，復刊後一個多月病情忽然爆發，倒在香港報館的辦

公桌上！立即送上海治療後，仍無好轉，終於在一年後，即1949年4月14日，離六十歲還差80天時病逝於上海虹橋醫院。胡政之永遠離開了他視之為生命的《大公報》。

巨星陨落，各界同悲。報館同仁紛紛撰文悼念。金庸文章的標題是「再也聽不到那些話了」，蕭乾的是「我被感動過」，陳凡的是「我所見的，我所佩服的」，只見標題，其痛悼感懷之情已躍然紙上。朱啓平則言要「以工作代哀思」，「使大公報更成為代表國家、服務人民的報紙，那政之先生雖死猶生」。李俠文在自撰文章的末尾寫道：「他的事業，他的事業精神，尤其是他做人的道理是不死的」。

110年過去了，而今大公報立足香港，依然在報界佔有一席之地。撫今追昔，胡政之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風範，永值得銘記。

▼胡政之將其主編的《回憶胡政之》贈與大公報110周年報慶 本報記者步瀟瀟攝



「胡政之活了60歲，近40年都傾注在新聞事業上，其中在大公報前後總計27年。」大公報110年華誕前夕，胡政之孫女胡政接受專訪時說：「從家人的角度上說，這位長輩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就是對自己事業執著、熱情、堅強，和對國家民族的熱愛。」

胡政之1889年生於成都，1907年赴日留學，1911年歸國。翌年即投身報界，受聘上海《大公報》，自此，終其一生，與新聞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。1916年10月，移居天津的胡政之受聘擔任大公報主筆兼經理。從1916年到1920年近四年期間，他的新聞才華得到了初步顯現。他大膽對報紙進行內容和形式上的全方位改革。

巴黎和會唯一中國記者

1917年1月3日，胡政之在大公報上發表元旦寄語《本報之新希望》，提出了「改良新聞記事」的主張，認為「新聞事業之天職有二：一在報道真確公正之新聞，一在鑄造穩健切實之輿論」。為充實新聞內容，他在全國十幾個大城市招聘「訪員」到新聞發生地「專司採訪」，還經常親自出馬。在他主持報社期間，全國乃至世界發生的大事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特別是其中中、美、德、日的關係；張勳復辟前後等等大事都有及時詳盡的報道。他大膽革新版面，順應時代潮流，增設傳播新思想的教育、文化、經濟等專欄。很快，《大公報》重新贏得了當年創辦時的聲譽，不到一年銷量已過萬份。

胡政之說：在此時期，胡政之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曾有一次重要的採訪活動，也是他一生引以為榮的，那就是「一戰」結束後作為戰勝國新聞記者採訪巴黎和會。1918年底，胡政之離開天津，經日本坐船先到紐約，後到巴黎，是唯一到和會現場的中國記者。從1919年4月到7月，他發回大量「巴黎專電」，撰寫多篇「巴黎特約通訊」，對會議情況作了詳盡敘述，並發表評論，均及時登載在大公報上。

1920年5月，胡政之回國，複雜多變的形勢使他辭去了大公報的工作，後加入了林白水主持的《新社會報》，1921年之後又創辦了國聞通訊社、《國聞週報》，繼續文章報國。而同一時



▲胡政之孫女胡政 本報記者馬浩亮攝

期，大公報卻在不斷走下坡路，直至1925年底停刊。

經營管理注重創新

1926年9月1日，已經關閉多日的《大公報》在天津重新開張。這是吳鼎昌、張季鸞、胡政之聯合以「新記公司」的名義開辦的。這也是胡政之第二次進《大公報》。在此以後直至1949年逝世的23年中，吳鼎昌從政離開，張季鸞1942年不幸病逝，只剩下胡政之始終堅守，傾注了全部心血。

胡政之說：胡政之在主持大公報期間，主要的貢獻包括在文章採編、經營管理、提攜人才等幾個方面。一方面，記者出身的胡政之，自己身先士卒採訪報道了許多重大事件。從1926年到1936年十年間，赴南方考察北伐軍、武漢國民政府，採訪孫科、宋子文；「九一八」事變後即刻赴北京至協和醫院見張學良，是事變後第一位採訪張的記者；兩次面見蔣介石；赴香港見李宗仁、陳濟棠等。另一方面，派記者陳紀澄去東北報道「九一八」兩周年，支持范長江報道中國的西北角，對於宣傳抗戰和讓外界了解解放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胡政之新聞思想最本質的是新聞記者最早出現在第一線，客觀真實的報道事實。

在經營管理方面，胡政之非常注重創新。雖然是舊社會走出來的知識分子，但思想不保守。在報業方面不斷在學習接受先進的東西。親率大公報同仁赴日本參觀《朝日新聞》、《每日新聞》等報館。每次利用出國的機會，如採訪巴黎和會、出訪英國、參加聯合國大會等機會，考察各國的通訊社、印刷廠、印刷機器廠、造紙廠、報社、電台，學習新方法，並不斷引進新設備。他秉持着一個信念，就是希望中國報業能在世界新聞界佔有一席之地。不斷學習西方的東西，同時也結合中國自己的情況，探索研究完善經營理念，培養和用人的方面，創新建立了一整套的用人制度、考核制度，使大公報始終走在了中國報業的前列。

提攜人才不遺餘力

胡政之在延攬、提攜、培養人才方面一直備受稱道，周恩來就高度肯定大公報為中國新聞事業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。范長江、陳紀澄、徐鑄成、金庸、蕭乾、朱啓平、李俠文等等，燦若群星。

以蕭乾為例，第一篇小說《蠶》、第一篇旅行通訊《平綏瑣記》都是發表在大公報上。後被胡政之看中委以重任，編文藝副刊。後又兩次出錢資助他到了英國留學。1943年，胡政之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訪英，藉此機會專門去看望蕭乾，勸他不做學者做記者。蕭乾接受了勸告，學期結束後脫去黑袍走上戰地記者崗位。

1945年聯合國大會在三藩市舉行，報館電召蕭乾從萊茵前線趕赴美國，胡政之也是中國代表團成員。一天晚上蕭乾還沒睡着，接到胡政之的緊急電話趕往胡所在的旅館，胡政之已經在大廳焦急等待了。胡政之說：「剛才蘇聯代表團莫洛托夫向宋子文敬酒時我聽到了，翻譯過來就是說歡迎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簽訂《中蘇互助條約》，我趕緊裝作解小手溜出來給你打電話。」蕭乾聽完一個箭步躍上人行道，喊了輛出租車疾馳向電報局，給重慶大公報發了特急電。次日，這條轟動全國的獨家消息在大公報要聞版頭條刊出了。

胡政之說：「解放後，蕭乾還和我們家有些來往，他說他特別感謝胡政之，如果身體好，一定要寫個胡政之傳。他說他的人生道路，胡政之給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」

主持大公報貢獻最大

胡政之說：「我父親曾經對我說過，你爺爺有咱們四川人的一股勁兒，幹什麼就一定要幹成。抗戰期間，大公報堅持不在日佔區辦報，報社從天津到上海，武漢不成又到重慶，香港不成又上桂林，最多的時候同時開了六處大公報。這種堅持和執著，就是一種文章報國的樸素思想，通過自己的知識、事業報效國家。」

新聞史泰斗方漢奇評價說：在胡政之的主持下，大公報各版的總發行量由初辦時的幾千份，一度增長到20萬份，成為一度擁有天津、上海、漢口、重慶、桂林、香港等六個版的全國性大報。「這一切當然不能完全歸功於胡政之一人，但無疑以他的貢獻為最大」。



▲胡政之（右二）、張季鸞（右三）1939年合影